陆机陆云思想趣向探微

周国林

(华中师范大学 历史文献研究所,武汉 430079)

摘要: 陆机、陆云不仅是魏晋时期著名的文学家,在思想史上也占有一席之地。二人虽长于玄谈,思想基础却是儒家学说。他们崇尚统一的国家观念,以人为本的治国方略,是颇具特色的。

关键词: 陆机;陆云;思想

中图分类号: B235 文献标识码: A 文章编号: 1000-2456(2000)01-0091-05

魏晋之间的重要作家陆机(公元 261~303)、陆云(262~303)兄弟,时号"二陆"。机字士衡,云字士龙,吴郡华亭(今上海松江县)人,出身于吴国的高级士族。祖父陆逊,官至丞相,父亲陆抗,官至大司马。吴国灭亡后,机、云兄弟二人退居旧里,闭门勤学,积有十年。公元 289年,奉晋武帝之诏入洛,在文坛崭露头角。陆机天才秀逸,辞藻宏丽,又妙解情理,心识文体,为"太康之英"。陆云虽文章不及其兄,而持论过之。以致太常张华赞叹:"伐吴之役,利获二俊"[1](p1472)。对于喜爱他们诗文的人来说:"每读二陆之文,未尝不废书而叹,恐其卷尽。"[2](p7)

如果说二陆在文坛一帆风顺的话,在仕途上就是一路坎坷了。最后,二人被卷入权力争斗的政治漩涡,而遭灭顶之灾。多年来,人们吟诵二陆诗文,感叹二陆遭际,评说二陆成就得失,而对其心路历程,价值取向及其思想成果却少有涉及。事实上,二陆是有思想深度的文学家。陆机临死时,深以所作子书未成为遗。《隋书·经籍志》子部道家类记载陆云撰有《陆子》十卷。时人称赞:"诚为快书者,其辞之富者,虽覃思不可损也。其理之约者,虽潜笔腐豪不能益也。"[3](p2709)这是值得后人注意的。所以,本文主要从思想角度,对二人的诗文与言行加以诠释,力图抉发他们的思想趣向,揭示他们短暂一生中行事的逻辑联系。这对客观而公正地评价二陆的思想、文学成就及其历史地位,或许有所助益。自然,将二人合在一起研究,是以其关系亲密无间、思想信念一致为前提的。

一、儒学为体的思想根基

谈到魏晋士人的文学创作,人们自然会将其同当时的玄学思潮联系起来。这在陆机、陆云二人就更不用说,因为现存典籍中,"玄学"二字最早出现在有关他俩的事迹记载里面。《晋书·陆云传》中说:

> 初,云尝行,逗宿故人家,夜暗迷路,莫知所从。忽望草中有火光,于是趋之,至一家,便寄宿,见一年少,美风姿,共谈《老子》,辞致深远。向晓辞去,行十许里,至故人家,云此数十里中无人居,云意始悟。却寻昨宿处,乃王弼冢。云本无玄学,自此谈《老》殊进。

这段记载,很为荒诞。不过,这并不重要,让我们感兴趣的是它把《老子》与玄学、王弼与陆云连到了一起。《水经注》卷十六《谷水》中有一段文字,与此大致相同,只是"陆云"之名变成了"陆机":

> 其泽野负原夹郭,多坟陇焉,即陆士衡会王辅嗣处也。袁氏《王陆诗》,叙机初入洛,次河南之偃师,时忽结阴,望道左右民居者,因往逗宿,见一少年,姿神端远,与机言玄,机服其能而无以酬折,前致一辩。机题纬古今,综检名实,此少年不甚欣解。将晓去,税驾逆旅,妪曰:"君何宿而来?自东数十里无村落,止有

收稿日期: 1998-05-28

作者简介: 周国林(1953-),男,湖北枝江人,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献研究所教授,主要从事历史文献学理论研究。

?1994-2015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. All rights reserved. http://www.cnki.net

王家墓。”机乃怪怅,还睇昨路,空野霾云,攒木蔽日,知所遇者审王弼也。

兄弟二人究竟是谁见到王弼的鬼魂,自然是谁也无法稽考的。而二人在入洛后“谈《老》殊进”确是不争的事实。时人嵇君道说:“吾在洛与二陆雕施如意,兄弟并能观况身于泥蚌之中,识清意于未□之□。诸谈客与二陆言者,辞少理畅,语约事举,莫不豁然,若春日之泮薄冰,秋风之扫枯叶。”[4](p2),他们的诗文,不少作品明显带有玄学色彩。如陆机有《招隐》诗数首,前二首云:

驾言寻飞遁,山路郁盘桓。芳兰振惠叶,玉泉涌微澜。嘉卉献时服,灵术进朝餐。

寻山求逸民,穹谷幽且遐。清泉荡玉渚,文鱼跃中波[5](p41)。

陆云则有《逸民赋》二篇,第一篇起首云:

世有逸民兮,栖迟乎于一丘。委天刑之外心兮,淡浩然其何求?陋此世之险隘兮,又安足以盘游?杖短策而遂往兮,乃枕石而漱流。载营抱魄,怀元执一。傲物思宁,妙世自逸。静芬响于永言,灭绝景于无质。相荒土而卜居,度山河而考室[6](p1)。

二人笔下追求寂寞、向往山野生活的境界,在崇尚玄谈的人中是很常见的。不过,倘若据此认为二人的思想已经玄学化,那就错了。《世说新语·简傲篇》中说:

陆士衡初入洛,咨张公所宜诣,刘道真是其一。陆既往,刘尚在哀制中,性嗜酒,礼毕,初无他言,唯问:“东吴有长柄壶卢,卿得种来不?”陆兄弟殊失望,乃悔往。

很显然,他们非常看重礼法制度没有玄学中人那样的放达、洒脱气派。有记载说:“陆君深疾文士放荡流遁,遂往不为虚诞之言,非不能也”[3](p2697)。于此可见,他们的谈玄,只不过是凭借他们深厚的文化功底,以文学家超凡的才华和雄辩的口才,厕身于谈玄说虚者的行列中,扩大自己的影响而已。他们的内心深处,儒家思想占据着主导的地位。就说陆云吧,年青时,他已被人称作“当今之颜渊”[7](p236)。不消说,“颜渊”的儒家思想是不易改变的①。其《寒蝉赋》序中,列举了寒蝉的文、清、廉、俭、信、容六德,然后笔锋一转,说是“君子则其操,可以事君,可以立身,岂非至德之虫哉!”[6](p21)从他推崇的行为准则,不难发现他的思想趋向。他的一些书信,则直接吐露出崇尚名教的心声:“少长之礼,教化所崇。中叶陵迟,旧章废替。追惟前训,思遵在昔。”“长幼之序,人伦大司。季世多难,失敬在昔。敢希令典,求思自迈”[6](p163)面对世风日下的局面,他简直要以恢复名教往日地位为己任了。

兄弟二人的行为,更是体现出儒家勇于进取的精神,陆机表现得尤为突出。“八王之乱”初期,二人依附赵王司马伦。伦败,机被收付廷尉,赖成都王颖、吴王晏并救理之,得减死徒边,遇赦而止。“时中国多难”,东南名士顾荣、戴若思等人都劝机还吴,“机负其才望,而志匡世难,故不从”。在依附司马颖后,为参大将军军事、平原内史。颖起兵讨伐长沙王乂,假机后将军、河北大都督,领兵二十万。“机以三世为将,而王粹、牵秀等皆有怨心,固辞都督。”司马颖不同意,陆机也就不再坚持。当乡人孙惠这时劝机让都督于粹,机便以“将谓吾为首鼠避贼,辞所以速祸”为由加以拒绝,率军出发。[1](p1479)后果遭宦人孟玫谗言,为牵秀所杀。

事实上,陆机对这种结局,是有所警惕的。在讥刺齐王冏的《豪士赋》中,他对“道家之忌”讲得头头是道:“忌盈害上,鬼神犹且不免”“身危由于势过,而不知去势以求安;祸积起于宠盛,而不知辞宠以招福”“圣人忌功名之过己,恶宠禄之逾量。”可是他自己的行为就如同他讥讽齐王冏的那样:“笑古人之未工,忘己事之已拙,知曩勋之可矜,暗成败之有会。”[5](p14)自言而自蹈之,以致唐太宗有“知易而行难”、“智不逮言”的评论。[1](p1488)这样的解释虽不无道理,但总有点不妥。二陆的遇害,最根本的还在于他们受进取心的驱使,“知其不可而为之”,已经顾不了仕途上的风险。这也就是说,远害全身的道家意识并未在他们头脑中扎下根来。他们在诗文中写隐士,写逸民,写神仙,只不过反映了一些外层的情感而已。指导他们思想的理论基础,到底还是入洛之前已在头脑中扎根的儒家学说。

二、克振家声的世族意识

二陆出身于东南高门,头脑中是有一定的优越感的。“初,陆机兄弟志气高爽,自以吴之名家,初入洛,不推中国人士。”只是在见到张华后,才“钦华德范,如师资之礼焉”[1](p1077)。至于一般人士,他们更是没放在眼中。如原为陆抗部属的吾彦,入晋后累迁至南中都督、交州刺史,二陆起初就不愿搭理他,后来经人劝说,为了不失去南方人

① 《世说新语·自新第十五》,《晋书》卷五十八《周处传》中,都有陆云以《论语》中思想开导周处的记载。或以为非实事,故仅附记于此。

?1994-2015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. All rights reserved. http://www.cnki.net

的支持,才改变了态度。这样一种优越感,表明他们在当时的社会环境里已经滋生出浓厚的世族意识。而他们在政治上勇于进取,也与这种世族意识分不开。

对先辈的显赫业绩,二陆心中充满了景仰之情。诔颂一类文字,陆机有《吴贞献处士陆君诔》《吴大司马陆公诔》,陆云有《吴故丞相陆公诔》《祖考颂》。他们还以先人业绩为题材,写为唱和之诗。陆机《赠弟士龙诗》十首,起首即云:

> 於穆予宗,禀精东岳。诞宜祖考,造我南国。南国克靖,实繇洪绩。惟帝念功,载繁其锡。其锡惟何?玄冕衮衣。金石假乐,旄钺授威。匪威是信,称乎远德。奕世台衡,扶帝紫极[6](p44)。

陆云则在答诗中回应:

> 伊我世族,太极降精……功昭王府,帝庸厥勋。黄钺授征,锡命频繁。阚如武虎,肃滋三军。光若辰躔,亮彼公门。仍世上司,芳流庆纯[6](p47)。

与家庭的这种荣耀感相伴随的,是对先世基业衰落的惋叹:

> 瞻仰洪范,实忝先基。巍巍先基,重规累构。赫赫重光,遐风激鹜。昔我先公,爰造斯猷。今我六蔽,匪崇克扶。悠悠大道,载邈载遐。洋洋渊源,如海如河。昔我先公,斯纲斯纪。今我末嗣,乃倾乃圮。世业之颓,自予小子。仰愧灵丘,衔忧没齿[6](p48)。
>
> 昔我先公,邦国攸兴。今我家道,绵绵莫承。昔我昆弟,如鸾如龙。今我友生,凋俊坠雄。家哲永徂,世业长终。华堂倾构,广宅颓墉。高门降衡,修庭树蓬。感物悲怀,怆矣其伤[6](p49)。

自然,兄弟二人不甘心巍巍先基毁于自己这一代,他们力思振作,努力奋斗,跻身于社会上层,光大祖先的基业。为此,他俩携手并肩,相互信赖。陆机称赞陆云:“伊我俊弟,咨尔士龙。怀袭瑰伟,播殖清风。非德莫勤,非道莫弘。垂翼东畿,耀颖名邦。绵绵洪统,非尔孰崇。”[6](p45)反过来,陆云称美陆机:“惟我贤昆,天姿秀生。含奇播殊,明德惟馨……恢此广渊,廓彼洪懿。弘道忭享德,渊哉为器。统我先基,弱冠慷慨。将弘祖业,实崇奕世”[6](p47)。

以光大祖业为己任,就不能满足于做一介文士,而要充分发挥出全部的能量,在政治舞台上有所建树。陆机《遂志赋》有云:

> 匪世禄之敢怀,伤兹堂之不搆。理或睽而后合,道有夷而弗顺。傅栖岩而神交,伊荷鼎以自进。萧绸缪于丰沛,故攀龙而先跃。陈顿委于楚魏,亦凌霄以自濯。伍被刑而伏剑,魏和戎而拥乐。彼殊涂而并致,此同川而偏溺。祸无景而易逢,福有时而难学。惟万物之运动,虽纠纷而相袭,随性类以曲成,故圆行而方止。要信心而委命,援前修以自程。拟遗迹于成轨,咏新曲于故声。任穷达以逝止,亦进仕而退耕。庶斯言之不渝,抱耿介以成名[5](p16)。

从前人由贱而兴的事迹中,陆机认识到他们都是有所凭借的,抓住时机非常重要,象傅说版筑、伊尹荷鼎,都是“自进”的途径,这就很值得效法。只有这样,才能“咏新曲于故声”。兄弟二人长于文学、通晓《老》《庄》,不正是“自进”的手段吗?史称陆机“好游权门,与贾谧亲善,以进趣获讥”[1](p1481)。又说贾谧开阁延宾,海内辐凑,“贵游豪戚及浮竞之徒,莫不尽礼事之”[1](p1173)。陆机、陆云二人,名列“二十四友”之中。这些记载,都对二陆与贾谧的交游持否定态度。却没有充分注意到,二陆之附会贾谧是受其克振家声的思想所支配,自有其苦哀,和一般低三下四谄媚权贵者是不同的。更何况,他们采取的是“以文会友”的形式,不损及他人利益,实在是无可厚非的。

三、崇尚统一的国家观念

二陆的文学作品,文学史研究者一般认为存在着形式主义的倾向,但对二人怀念故土之作,评价较高。如陆机《又赴洛道中二首》:

> 总辔登长路,呜咽辞密亲。借问子何之,世网婴我身。永叹遵北渚,遗思结南津。行行遂已远,野途旷无人。山泽纷纡余,林薄杳阡眠。虎啸深谷底,鸡鸣高树巅。哀风中夜流,孤兽更我前。悲情触物感,沉思郁缠绵。伫立望故乡,顾影凄自怜。
>
> 远游越山川,山川修且广。振策陟崇丘,安辔遵平莽。夕息抱影寐,朝徂衔思往。顿辔倚嵩岩,侧听悲风响。清露坠素辉,明月何朗。抚枕不能寐,振衣独长想[5](p40)。

论者以为,诗作“不甚铺排辞藻,而能比较形象地写出诗人去国远行途中的一些亲自感受”[8](p231)。二陆文集中,这样的诗作还有不少。对于出自于东南、先辈又在东南创造业绩的高门后裔来说,这是很自然的。临死之时,陆机叹息:“欲闻华亭鹤唳,可复得乎!”[7](p479)对故土浓厚的眷恋情结,一直

?1994-2015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. All rights reserved. http://www.cnki.net

伴随到他生命的终结。

对故土的眷恋,其中也包含着对吴国灭亡的哀思,还有对自己不能挽狂澜之既倒的羞愧之心。陆机赠陆云的诗中说:

有命自天,崇替靡常。王师乘运,席江卷湘。虽备官守,守从武臣。守局下列,譬彼飞尘。洪波电击,与众同泯。巅跋西夏,收迹旧京。俯渐堂构,仰懵先灵。孰云忍愧?寄之我情[6](p45)。

这种故土之思,有其必然性。陆氏家族的荣辱与盛衰,本来就是同孙吴政权的存亡联系在一起。不过,陆氏兄弟的国家观念,却未受到这种情感的支配。他们把三国这段历史放到历史发展的长时段之中,认识到分裂状态只能是短暂的。在《答贾谧》诗中,陆机追溯一百年前的历史说:“在汉之季,皇纲幅裂。”“王室之乱,靡邦不泯。如彼坠景,曾不可振。乃眷三哲,俾乂斯民。启土虽难,改物承天。”“爰兹有魏,即宫天邑。吴实龙飞,刘亦岳立。”然而,三国之间征战不已,“干戈载扬,俎豆载戢。民劳师兴,国玩凯入。”在这种局面下,“天厌霸德,皇祚告衅。狱讼违魏,呕歌适晋”[5](p47)。割据一方的霸业,最终让位于全国统一的大业,这是谁也改变不了的历史方向。认识到这一层道理,就使他们能够以理智支配情感,有故国之思而无亡国之痛,很快地接受了吴国灭亡的现实,转而为全国统一的局面而讴歌。

在二陆的诗作中,歌颂晋国功业的文字随处可见。如陆机《皇太子宴玄圃宣猷堂有令赋诗》:

时文惟晋,世笃其圣。钦翼昊天,对扬成命。九区克咸,讴歌以咏[5](p37)。

《赠冯文罴迁斥丘令》:

於皇圣世,时文惟晋。受命自天,奄有黎献。阊阖既辟,承华再建[5](p45)。

又如陆云《赠顾骠骑后二首》:

有皇大晋,时文宪章。规天有光,矩地无疆。神笃斯祜,本显克昌[6](p35)。

《大将军宴会被命作此诗》:

皇皇帝祜,诞隆骏命。四祖正家,天禄保定。睿哲惟晋,世有明圣。如彼日月,万景攸正[6](p30)。

从二陆对晋朝统一大业的赞颂可知,他们从南方到中原,是以深邃的思想为基础的。如果说他们的世族意识在今日看来显得狭隘的话,他们的国家观念实在称得上通达。在大一统的国家观念支配下进入仕途,就是为国家统一事业而贡献自己的力量。

还有一点也很重要,“出自敌国”之人到中原立足,同光大祖业并不矛盾。当时,“江南初平,人物失叙”,“楚国之良,沉宝积实,未重大朝”[6](p165),“东国之士,进无所立,退无所守,明裂眦苦,皆未如意”[6](p170)。二陆努力在政治上施展自己的才华,并通过自己的影响力,举荐南方有为之士,成为他们的中坚,“绍季札之遐踪,结鬲肝于中夏,光东州之幽昧,流荣勋于朝野”[6](p171)。这不是在更大范围内光大祖业吗?国家与家族的利益,在这一点上得到了统一。

四、以人为本的治国方略

二陆自吴入洛,除了具有远大的政治抱负,还有成熟的政治主张。虽然陆机的子书未完成,陆云的《陆子》在唐代已亡佚,对了解他们系统的思想主张是不可弥补的损失,但他们大量的诗文仍然透露出不少精粹的认识,反映了他们对历史与现实深沉的思考。就治国谋略方面而言,大体上可以用“以人为本”来概括。他们论述得最充分的,有以下几点。

其一,国家的存亡在于任用贤人。吴亡之后,陆机以孙氏在吴,而祖、父世为将相,有大勋于江表,深慨孙皓举而弃之,于是论析孙权之所以得天下,孙皓之所以失天下,又欲表章先辈功业,遂作《辨亡论》二篇。陆机追溯吴国建国史,先是孙坚,孙策奠定基础,张昭、周瑜二君子“皆弘敏而多奇,雅达而聪哲,故同方者以类附,等契者以气集。”待孙权继位,“豪彦寻声而响臻,志士希光而景骛,异人辐辏,猛士如林。”“故遂割据山川,跨制荆、吴,而与天下争衡矣。”[5](p126)而到吴国末年,“群公既丧,然后黔首有瓦解之志,皇家有土崩之衅”[5](p127)。为何如此?陆机认为是“彼此之化殊,授任之才异也。”[5](p128)针对“吴蜀唇齿之国,蜀灭则吴亡”的必然亡国论,陆机指出:“夫蜀,盖藩援之与国,而非吴人之存亡也。”[5](p131)在蜀亡之初,大司马陆抗总领西部兵马“东西同捷,献俘万计”便是明证。他的结论是“人之云亡,邦国殄瘁”这句古训[5](p132)。对此,陆云极表赞同。他说:“官人,国之所废兴也。古之兴王,唯贤是与。”[6](p121)又说:“开国承家,勿用小人。”[6](p41)至于如何任用贤人,主要是大胆的提拔、放手的使用、丰厚的赏赐,如《辨亡论》说:“接士尽盛德之容,亲仁罄丹府之爱。”“推诚信士,不恤人之我欺;量能授器,不患权之我逼。”“卑宫菲室,以丰功臣之赏;披怀虚己,以

?1994-2015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. All rights reserved. http://www.cnki.net

纳谟士之算。”[5](p130)这样,就能“忠臣竞尽其谟,志士咸得肆力,洪规远略,固不厌夫区区者也。”[5](p131)

其二,国家的根基在于民众。“以人为本”,在社会的基层,就是要以民众利益为本,并把它视为各种政策的出发点。《辨亡论》中说,三国鼎立时,魏国力量最强大,然而“曹氏虽功济诸华,虐亦深矣,其民怨矣”,故而不能统一天下。吴国力量虽弱,却因“其求贤如不及,恤民如稚子”,得以同其抗衡。故谈到国家存亡的天时、地利、人和三要素时,陆机特别强调“人和”:

> 吴之兴也,参而由焉,孙卿所谓合其参者也。及其亡也,恃险而已,又孙卿所谓舍其参者也。夫四州之萌非无众也,大江之南非乏俊也,山川之险易守也,劲利之器易用也,先政之策易循也,功不兴而祸遘者,何哉!所以用之者失也。是故先王达经国之长规,审存亡之至数,谦己以安百姓,孰惠以致人和,宽冲以诱俊乂之谋,慈和以结士民之爱。是以其安也,则黎元与之同庆;及其危也,则兆庶与之共患。安与众同庆,则其危不可得也;危与天下共患,则其难不足恤也。夫然,故能保其社稷而固其土宇,《麦秀》无悲殷之思,《黍离》无愍周之感矣。[5](p132)

这段话,对“民惟邦本”的道理讲得够透彻的了。所以,身居高位者,务必要“振我远德,归于时民”[6](p41)。这样,就能“大化既治,百姓无匮于心”了[5](p92)。

其三,政权的稳定在于政治体制。自秦朝推行郡县制之后,如何处理郡县制与封建制的关系,让历代统治者及政治家伤透了脑筋。诸侯的权力大了,会与中央分庭抗礼;权力小了,又起不到藩屏王室的作用。陆机对政治体制有较深入的思考,撰写了《五等封建论》。他的基本观点,是赞成实行封邦建国制,认为“帝业至重,天下至旷,旷不可以偏制,重不可以独任,所以弘其制也。于是乎立其封疆之典,财某亲疏之宜,使万国相维,以成盘石之固;宗庶杂居,以定维城之业。”[5](p135)同郡县制下“君无卒岁之图,臣挟一时之志”的状况相比,五等诸侯“知国为己土,众皆我民,民安己受其利,国伤家婴其病。故前人欲以垂后,后嗣思其堂构,为上无苟且之心,群下知胶固之义。”[5](p138)给诸侯多大的权力呢?他认为西汉初年显得给得多了,“汉矫秦枉,大启侯王,境土逾境,不遵旧典,故贾生忧其危,晁错痛其乱。”不过,后来又似乎给得太少,“逮至中叶,忌其失节,割削宗子,有名无实,天下旷然,复袭亡秦之轨矣”[5](p136)。他所主张的,是有限度的封建制。

应该说,陆机的这些认识没有多少过人之处。自汉代以后,封建制总是同郡县制纠缠在一起,诸侯的权力总体上是逐渐削弱。不过,陆机积极思考这个问题,把政权的稳定同政治体制、同地方长官的政治利益结合起来考虑,是有其认识价值的。

治国谋略方面,二陆还提出了“明君执契,以要克谐之全”[5](p91)、“道民在简,为政以仁”[5](p112)、“厚戒丰奢”[6](p151),“齐之以法,使下知禁”[6](161)等政策和策略,都是颇有见地的。

上面,对陆机、陆云的思想趣向作了一些初步探索。二人虽然长于玄谈,但其思想基础是儒家学说,加之他们具有崇尚大一统的国家观念和振兴家族的思想,所以在仕途上勇于进取,盼望建功立业。他们的死,显然是不能仅仅用“智不逮言”加以解释的。当时,统治阶段内部互相倾轧,南方人遭到排挤,每一个偶然因素都可能影响一个人的一生,人们难以掌握自己的命运。因此,二陆之死,不仅是他们个人的不幸,也是时代的不幸。所幸的是他们在自己的短暂的一生中,充分地利用了自己的头脑和双手,留下了一笔不小的文化遗产,也在文化史上占有了一席之地。

哀哉陆子!幸哉陆子!

[参 考 文 献]

[1] 房玄龄.晋书[M].北京:中华书店,1974.

[2] 虞世南.北堂书钞:卷一百[M].南海孔氏三十有三万卷堂刻本,1888.

[3] 李日方.太平御览[M],北京:中华书局,1985.

[4] 虞世南.北堂书钞:卷九八[M].南海孔氏三十有三万卷堂刻本,1888.

[5] 陆机.陆机集[M].北京:中华书局,1982.

[6] 陆云.陆云集[M].北京:中华书局,1988.

[7] 刘义庆.世说新语[M].北京:中华书局,1984.

[8] 游国恩.中国文学史:第一册[M].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1963.

[责任编辑] 沈继成

?1994-2015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. All rights reserved. http://www.cnki.net